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58期
2022年11月，頁115-156
10.30383/TJH. 202211_(58).0004

中共在陝西渭北地區的發展，1930-1933

陳耀煌*

1930年代中期以前陝西地區的共產革命在中共革命史的研究中，往往較不受到重視。學者們大多只會提到劉志丹、謝子長，或者是他們所領導的陝甘邊區和游擊隊與紅軍，甚少提到陝西其他地區的革命運動和人物。事實上，陝西地區的共產革命還有許多值得探究之處。其中渭北革命根據地更可說是中共在陝西地區所建立的第一塊農村根據地，但相關研究並不算多。本文擬利用當代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共組織史資料等材料，主要是透過對中共陝西省委和渭北等地區的黨組織及其成員進行分析，藉此探究1930年代前期渭北乃至整個陝西地區共產革命運動中尚未被人發現的某些特質。

關鍵詞：陝西省、渭北地區、中國共產黨、農村根據地、組織史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通訊地址：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Email：mhcyh@gate.sinica.edu.tw

一、前言

提到陝西地區的共產革命，一般人總會聯想到抗戰時期的陝甘寧邊區。但是，早在毛澤東率領紅軍抵達陝北以前，中共在陝西地區的活動已有十多年的歷史，只不過相對上沒有受到太多重視罷了！這主要當然就是因為 1930 年代中期以前中共在陝西地區，並沒有如在華中、華南地區般，建立大規模的蘇維埃政權。在陝西的城市地區，中共亦無甚成績可言，事實上當時陝西的城市裡也沒有太多現代化的產業，所以也不可能成為無產階級工人運動的中心。¹而中共本身在陝西地區的組織，由於反覆的被破獲，即使是作為陝西地區最高的黨領導陝西省委，也斷續處於癱瘓狀態。至於西安以外各縣的黨組織，也不總是經常性的存在。因為這些因素，1930 年代中期以前陝西地區共產革命的歷史，並未受到太多的關注，相關的研究成果也不多。

當然，與早期陝西地區共產革命相關的研究也不是完全沒有。這些研究有的是探討劉志丹、謝子長所領導的陝甘革命根據地與游擊隊和紅軍，此一議題可以說是抗戰前陝西地區共產革命中的焦點之一，相關研究如任學嶺的《陝甘革命根據地史》。²有的則是關於陝西各地方的革命史，其中較值得注意的如《渭北革命根據地史》與《中國共產黨三原縣簡史》等著作。事實上，以三原縣武字區為中心的渭北革命根據地，是中共在陝西農村地區建立的第一塊根據地，其在陝西地區共產革命史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並不亞於劉志丹、謝子長的陝甘革命根據地，只不過在當代學者和讀者的心目中，其名氣不如後者，甚至很多人可能從未曾聽過渭北革命根據地。³再來就是關於某些個人的相關研究，如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就很受到關注，習仲勛

¹ 根據中共的調查，在 1930 年時，陝西規模較大的工廠只有華陰有一個兵工廠，西安有 4 個修械局、一個印刷局、一個精業公司，還有協和火油公司與汽車公司，延長則有一個石油廠等。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94），頁 57。

² 任學嶺，《陝甘革命根據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³ 中國共產黨三原縣委員會編，《渭北革命根據地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6）；中共三原縣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三原縣簡史（第一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2）。

就是渭北地區富平縣出身者，他本人也曾參與渭北革命根據地的活動，儘管他當時所扮演的角色並不如當代大陸官方學者所渲染般的重要。

美國學者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在 2021 年所出版的《意外的聖地：陝甘革命的起源》一書則是少數探討早期陝西地區共產革命的西方著作。只不過該書所探討的對象也是前面所提到的劉志丹、謝子長及其所領導的陝甘革命根據地和游擊隊與紅軍。根據周錫瑞的描述，劉志丹、謝子長所領導的游擊隊和紅軍，是一支缺乏組織紀律，有時還會訴諸土匪行徑的武裝隊伍。相反的，同時期的陝西省委則是由一群遵行中央指示的極左分子組成。後者與劉志丹等人所領導的武裝隊伍存在矛盾，甚至劉志丹、謝子長也經常受到省委的處分乃至撤職，陝甘革命根據地及其紅軍也因為被迫奉行省委的極左指示而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直到 1933 年陝西省委被國民黨當局破獲，省委領導大批被捕背叛後，劉志丹的紅軍和陝甘革命根據地才擺脫了省委的束縛。⁴

和周錫瑞探討的陝甘革命根據地相仿，本文所欲探討的渭北革命根據地也是於 1932 年前後開始建立起來，而且兩塊根據地在隔年同樣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和陝甘根據地不同的是，渭北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大多是渭北在地出身的幹部，而不是如陝甘根據地般由來自陝北的劉志丹、謝子長等幹部領導。那麼，這一塊主要由在地人發展建立起來的渭北根據地，其發展過程如何？它是否展現出來某些與陝西其他地區共產革命運動相同或不一樣的特質？這是本文所欲探究的議題。

本文所採取的方法，主要是針對 1930-1933 年間渭北地區以及同時期的陝西省委和陝西其他地區的中共組織及其成員進行分析。自從 1980 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即陸續出版了中共中央，以及各省、市、縣，乃至鄉級的中共組織史資料。本文主要參考的即是陝西省省級以及渭北各縣市出版的組織史資料。雖然這批組織史資料非常龐大，但迄今使用這批組織史資料進行研究者，非常少見。⁵除了組織史資料外，筆者並佐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

⁴ 周錫瑞著，石岩譯，《意外的聖地：陝甘革命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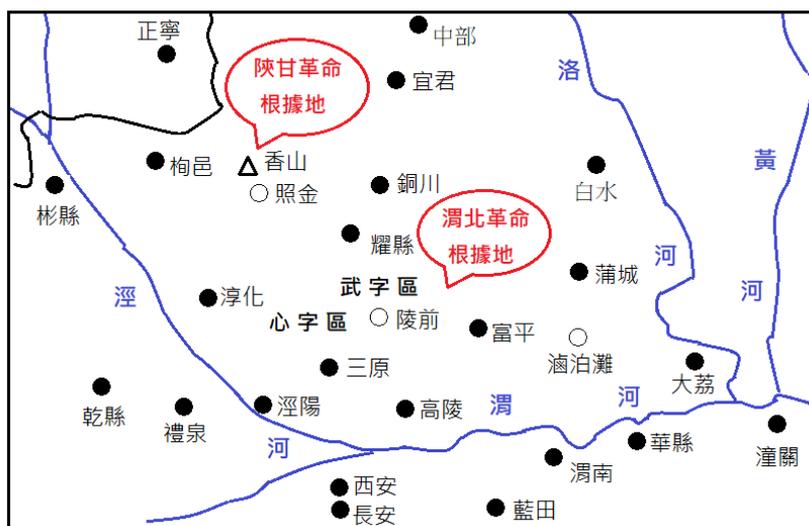
⁵ 筆者是第一個利用這批組織史資料進行研究，並曾出版：陳耀煌，〈北方地區的共產革命，1920-1927：一個組織史的考察〉，《新史學》，第26卷第1期(臺北，2015.03)，頁105-156，與陳耀煌，〈陝西地區的共產革命，1924-1933：一個組織史

等一手史料。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也是 1980 年代以後，大陸一些省、市陸續出版該地的中共革命史一手史料，其內容所收錄都是非常珍貴而且也是唯一的資料，是迄今研究中共地方革命史所參考的主要材料，前述如周錫瑞等人研究陝西地區共產革命史的著作中，也大量使用此一資料。透過組織史資料與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以及其他各種資料記載的對照，特別是通過對渭北地區以及同時期陝西省委等陝西其他地區中共組織的構成進行分析，本文嘗試去發掘此一時期渭北以及陝西地區共產革命運動中尚未被人注意到的某些特質。

二、陝西省委與陝西各地組織的分析

渭北革命根據地是中共在 1930 年代前期，在陝西省關中地區渭河以北，以三原縣的武字區、心字區為中心建立起來，包括三原、富平、涇陽、耀縣以及蒲城、白水縣等部分地區在內的一塊根據地。不過，在探討渭北革命根據地以前，有必要先對當時中共在陝西地區的最高領導陝西省委以及陝西其他地區的中共組織作一個簡單的分析，以方便與後述渭北地區的組織進行比較研究。

的考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3卷(臺北，2016.09)，頁41-86兩文，證實使用組織史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的可行性。



附圖一、渭北與陝甘革命根據地位置圖

由於篇幅所限，這裡是從 1930 年下半年的陝西省委開始進行分析。1930 年 7 月陝西省委在省委第五次擴大會議改組省委以後到隔年 3 月間，曾擔任陝西省委幹部的有書記杜衡，以及吉國楨、王芾南、高維翰、焦維熾、陳征、張文華、陳雲樵和趙伯平、黃子文共 10 人。⁶

這 10 個人毫無例外，全都是陝籍出身。除此之外，他們還具有以下幾點共同的特質。第一，非常年輕，10 人中即有 5 人是出生於 1905 年以後，最年長的吉國楨在 1930 年時也不過 32 歲前後，最年輕的黃子文在 1930 年時才約 21 歲而已。第二，10 人當中除了張文華可能是在國共分裂後加入中共，其他都是在國共合作時期加入的。用中共的話來說，就是陝西幹部「質量上還是民族革命運動高潮中的分子」，或者說「仍是停留在舊的知識分子的基礎上」。兼之陝西的學生知識分子，「大都是中農」甚或更富有的家庭出身

⁶ 中共陝西省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陝西省組織史資料》（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頁 86。

者。⁷這就形成陝西省委的另一個共同點，即缺少工農階級出身的幹部。上述1930年7月到隔年3月間陝西省委的10名成員中，除了趙伯平一位農民出身者外，其餘全都是知識分子出身。⁸

類似的特質也普遍存在陝西其他地區的黨組織中。這裡以陝北特委為例說明。自從1928年4月中共陝西省委在綏德成立陝北特委管轄周圍綏德、榆林、米脂等縣的黨務以來，陝北特委一直是陝西省委下轄最大的地方黨部。而陝北特委自1928年4月成立以後，迄1930年10月被劃歸北方局、河北省委管轄為止，先後曾擔任過陝北特委幹部的人共有杜衡、劉瀾濤、馮文江、楊國棟、焦維熾、謝子長、劉志丹、吉國楨、趙伯平、李力果與蘇士傑11個人。

根據對這11個人的分析，可以發現陝北特委與陝西省委確實具有某些相同的性質。首先就是強烈的地方性。上述名單出現的11人中，清一色也都是陝西人，而且除去趙伯平、蘇士傑以外，其餘全是陝北在地出身者。第二，這11名陝北特委幹部年紀也都相當年輕，其中生於19世紀的有兩位，生於1900-1904年間的有4位，生於1905年以後的有5位，生於1910年的劉瀾濤是其中最年輕者。第三，陝北特委也是建立在國共合作時期的舊基礎上，上述11人全是國共合作時期入黨，「所以陝北黨是在民族運動的高潮中發展出來」。而且11人中除去趙伯平是農民外，其餘全是知識分子，所以陝北黨的基礎「完全建築在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中，無產階級的基礎非常薄弱」。⁹陝北特委上述特質完全與陝西省委相仿。

但是，這樣的特質並不符合當時中共中央的標準。在1930年李立三主導下的中共中央要求包括陝西省委在內的各地黨組織，「發展和改造黨的基

⁷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69、84、87-88、153。

⁸ 趙伯平是陝西藍田縣人，1902年生，農民家庭出身。1926年趙伯平即投入藍田、長安一帶的農民運動，後曾任藍田縣委書記、陝北特委書記、三原中心縣委副書記等職。1933年時被捕，1936年西安事變後獲釋，以後曾先後在陝西省委、陝甘寧邊區工作。1949年中共建國後在西安市委與西北局等單位工作，曾擔任陝西省省長等職。文革時期受到迫害。1993年病逝。

⁹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103。

礎，盡量吸收城市工人與雇農分子入黨，以建立黨的無產階級基礎」。¹⁰當時中央所發的七十號通告也警惕各地黨組織，注意「農村的富農路線」以及「幹部中留戀舊的基礎」等組織上的右傾表現，七十號通告也被認為是中共黨史上左傾立三路線的開端。¹¹事實上，陝西省委在上述 1930 年 7 月召開第五次擴大會議就是為了要接受與討論七十號通告，同時改組省委。¹²陝北地方黨裡的黨員與幹部也被指摘許多是豪紳地主富農出身的分子，還被批評阻撓群眾鬥爭，甚至陝北特委在紅色五月鬥爭中「還幻想著與國民黨合作」等等。這也許正是中共中央會警惕不要留戀舊基礎的原因之一，特別是那些在國共合作時期入黨者，因為這些人對於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認識仍有些混淆。陝西省委當時也要求陝北黨，不要留戀舊的幹部分子，而要提拔新的工農幹部。¹³其中農民出身的趙伯平即是陝西省委在 1930 年 7 月省委第五次擴大會議後特別派去改組陝北特委的。¹⁴不過，根據上述對省委成員的分析，省委自身的改組也仍不能說是符合中央的要求。

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在 1931 年 1 月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後上台，取代李立三成為中共中央新一代的領導。新的中共中央雖然反對立三路線，卻仍和立三路線相同，認為目前革命形勢是高漲的。陝西省委也在 1931 年 3 月召開省委第六次全會，接受六屆四中全會的新路線。前省委中有幾位成員主張陝西革命形勢低落，被批評是「曲解國際路線的右傾觀念，都得到嚴重的打擊」。¹⁵其中張文華、張資平、黃子文因為堅持己見，遭到開除出黨的處分；李艮則是承認錯誤，所以仍留在黨內。陝西省委也在第六次全會上，選出新的省委。前省委書記杜衡因為被批評「執行立三路線的錯誤」而被撤換，改由高維翰擔任書記，杜衡仍任常委，另外還有黃平，以上 3 人為委員，其

¹⁰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144。

¹¹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六冊(1930)》(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頁30。

¹²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195。

¹³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153-154、161、176。

¹⁴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210。

¹⁵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325-339。

他還有秘書長焦維熾一人。其中杜衡、高維翰、焦維熾都是舊省委成員，黃平的個人資料不詳，但是他在 1930 年時就已經在陝西工作，他就是被提拔起來取代張文華的。¹⁶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的陝西省委，不僅繼承了過去李立三時期的左傾路線，也繼續批判陝西黨的基礎是「建築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與富農身上，無產階級成分等於零」，這的確也是事實。¹⁷所以陝西省委也要求自身和各地黨部，「徹底改造黨的基礎」，特別要「吸收工人、雇農、苦力入黨，驅逐消極怠工的分子和富農出黨，以加強黨的無產階級基礎」。¹⁸那麼，實際上又是如何？

1931 年 8 月中共中央派劉少文來陝視察工作。劉少文批評陝西省委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故於 8 月初召開省委全會，改組省委。其中劉少文認為杜衡是在省委領導中，「在政治上比較堅定，並有督率一切工作的能力」，故由其擔任書記兼組織。¹⁹省委其他成員還有：高維翰、劉萬海、李良、劉映勝。其中杜衡、高維翰、李良都是舊省委成員。渭南人劉映勝雖然不是前省委委員，但他也和杜衡等人相同，是國共合作時期即已加入革命行列的知識分子幹部，在 1931 年前後曾擔任至團省委書記和團西安市委書記，也是陝西組織中重要的資深領導幹部。

5 名新省委委員中，只有劉萬海是由巡視員劉少文提拔起來參加省委常委的新幹部。劉萬海是富平農民出身，後來陝西省委書記杜衡曾稱讚劉萬海是「富平最好的一個農民同志」。²⁰不過，劉少文提拔劉萬海，單單只是出於中央要求提拔工農分子的指示。而且劉萬海被調到省委工作後，其能力與政治認識顯然仍不足以擔負省委領導的工作，以至省委的工作經常只剩下書記

¹⁶ 任學嶺，《陝甘革命根據地史》，頁85-87；中共陝西省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陝西省組織史資料》，頁86；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699-701、727-728。

¹⁷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317。

¹⁸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128。

¹⁹ 中共陝西省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陝西省組織史資料》，頁82-83。

²⁰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 (I)》（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94），頁258、270。

杜衡和軍委書記高維翰兩個人在做，當時陝西省委因此就批評中央巡視員提拔工農分子的做法是「一句空話」。²¹

類似情形也發生在當時的西安市委。西安市委的領導也極不健全。大約在 1931 年 8 月初前後，中央巡視員劉少文和省委代表曾到西安市巡視，據說巡視員當時即說「只要贊成共產黨，就可以介紹入黨」，這主要是為了鼓勵西安黨提拔工農幹部。西安市委也在 8 月初進行改組，由 5 人組成，其中有兩位是工人黨員。這兩位工人也是在上級工農化的要求下，被刻意提拔進西安市委，而不是經由鬥爭被提拔起來的，只由劉少文親自給予這兩位工人幹部兩個星期的訓練。²²

然而，這兩位工人幹部也像被提拔進省委常委的農民幹部劉萬海般，能力極低。當劉少文和陝西省委到西安巡視時，他們批評西安市委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並要西安市委布置群眾迅速集合又迅速分散的飛行集會。可是當時西安黨在西安群眾間無甚基礎，群眾本身的政治認識與階級覺悟都還很薄弱。恰在此時，《西安日報》社爆發了工人群眾自發性的抗爭，此一抗爭本身帶有強烈的工人幫口抗爭的意味，即陝西籍與河南籍工人的對抗。整個過程中，西安市委雖然是領導者，卻顯得手足失措。兩位工人幹部反映了工人的困難與需求，希望市委提供工人金錢的援助，「有錢有辦法，沒錢沒辦法」；但是西安市委希望工人靠群眾路線解決金錢的困難，把工人組織起來。前者重視工人的現實處境，後者則強調群眾路線。結果中共未能滿足工人的需求，群眾鬥爭也就以失敗告終。西安市委中的兩位工人幹部因此退黨，其中一位在鬥爭失敗後，還鼓動其他 4 名工人黨員一起退出黨。西安市委也認為，這正是由於「猛然」的提拔一位什麼都沒做過的工農幹部到省、市、縣委，結果一遇到問題，就感覺沒辦法，「形成掛名」。像「這樣提拔幹部，等於自戕幹部」。²³

²¹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531。

²²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496、508、555。

²³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485-504、508、554-556。

總結的說，上述陝西省委、陝北特委和西安市委的情形，正反映了中共陝西組織的某些特色，第一就是強烈的在地性，即大多數幹部都是陝西在地人；第二就是幹部的變動性很低，到了 1930 年陝西省委與陝北特委主要仍是由國共合作時期即已入黨的年輕知識分子幹部擔任，上層也很少空降外籍幹部到陝西黨擔任領導。又，這些知識分子幹部大多是富裕家庭出身，要到 1930 年以後，特別是 1931 年在中共中央派巡視員的主持下，陝西省委和西安市委才刻意的提拔一些工農幹部到領導階層。

然而，陝西省委和西安市委在中共中央巡視員主導下刻意提拔的幾位工農幹部，都缺乏能力，反而弊大於利。事實上，中共中央的指示並不總是符合陝西地區的實際情形，因為中共中央及其巡視員並不了解，事實上也較不重視陝西的實際狀況。陝西省委在上述 1931 年 8 月中央巡視員劉少文離開後，就致信中央批評說「中央的政治領導是成問題的(就與陝西關係來說)」，「中央的一切決議和領導，不能很迅速的轉到地方黨部」。中央巡視員雖然「當面答覆的非常漂亮」，但是在巡視員走後兩個多月，除交通員帶回很少數的文件外，沒有片紙隻字。實際上中央巡視員在陝西時，也只是傳達一般的路線，而不是就具體的問題進行領導。²⁴但也正是因為陝西黨較少收到上層的領導與指示，也較少外來幹部的介入，所以陝西的共產革命才大多是由陝籍出身的幹部領導，也表現出較強烈的地方色彩。而這也是本文所欲探討的渭北革命根據地所具有的同樣特性。以下即就渭北地區共產革命的展開進行分析。

三、渭北革命根據地建立前蒲城縣組織的分析

上面已經就 1930 年前後的陝西省委、陝北特委以及西安市委進行分析，那麼，本文所欲探討的渭北地區的黨組織是否也存在上述陝西省委等組織所具有的特質呢？這裡首先就渭北蒲城縣的組織進行分析。

事實上，立三路線時期的陝西省委即曾批評蒲城黨，「黨員成分百分之

²⁴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517-519。

九十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因此產生了各種機會主義、不動主義或平和主義的偏向。²⁵所以在中共中央四中全會後，陝西省委秉承中央的旨意要求各地徹底改造黨的基礎，加強黨的無產階級基礎時，其中蒲城縣級領導組織即被要求撤換全體委員，並要提拔貧農或雇農參加等等。²⁶由此看來，蒲城黨在構成及其所表現出來的特質，頗類似陝西其他地區的組織。

那麼，實際上的情形又是如何呢？這裡即就蒲城縣級領導組織進行分析：

附表一、中共蒲城縣級領導組織構成表(1927.9-1931.6)

時間	組織	成員
1927.9-1928.3	蒲城區委	曹受祉(書記)、王懷謹、王菊人、亢伯毅
1928.3-1929.7	蒲城縣委	曹受祉、許尚志、李維屏、王勉之(以上4人先後擔任書記)、王懷謹、亢伯毅、許述善、閔繼騫
1929.7-1930.1	蒲城特支	張資平(書記)、許尚志、王韻清
1930.1-1930.8	蒲城特支	梁益堂(書記)、周至仁、李祥生
1930.8-1931.2	蒲城特支	黃平(書記)、周至仁、李祥生
1931.2-1931.6	蒲城特支	樊德音(書記)、許尚志、周至仁、李祥生

資料來源：中共蒲城縣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陝西省蒲城縣組織史資料(1926.冬-1987.10)》(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頁16-20。

如針對上表蒲城縣級幹部進行分析，可以發現，蒲城組織也和上述陝西省委等組織相同，即大多數成員都是國共合作時期加入革命行列的知識分子，其中亦不乏中上階級出身者。如書記曹受祉是蒲城在地人，雖然不清楚其家世背景，但是他「好交遊、疏財仗義，平易近人」，1926年入黨，1927年回蒲擔任教育局督學、教育委員，以及中共蒲城區委書記，1928年到上海

²⁵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118。

²⁶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130。

求學，隔年回陝籌辦西北文化公司，日後主要從事文化出版工作，也曾一度為中共中央特科做事，1940年代又回到蒲城辦理文化服務社，被人稱為曹老板。從其經歷看來，曹受祉的出身決非中下層。²⁷另一位王菊人則是清道光年間軍機大臣王鼎的五世孫，他的父親王廷弼也是光緒年間的進士，家世背景亦不簡單。

這些知識分子大多在當地完成早年的學業，然後進入西安、渭南地區的学校就讀，如曹受祉、王菊人、閔繼騫即西安成德中學出身。中共陝西黨早期一位重要的創建者魏野疇也曾在西安成德中學和渭南華縣的咸林中學等校任教，當時許多在西安、渭南求學包括蒲城縣出身在內的陝籍年輕知識分子，都是受到魏野疇的影響，因此加入中共的革命行列。

所以蒲城縣級幹部和上述陝西省委、陝北特委等組織的幹部相仿，大多是國共合作時期即入黨的年輕知識分子幹部。比較不同的是，與前面的陝北特委比較下，蒲城縣級領導的變動率較大。這主要是因為中共於1928年5月在緊鄰蒲城南邊的渭南與華縣發動渭華暴動。暴動失敗後，蒲城的組織也間接受到衝擊，所以在1928年3月到1929年7月間，蒲城縣委就先後換了4名書記，其中許尚志、李維屏、王勉之，以及委員閔繼騫，都曾參加渭華暴動。而且後4人中，除了許尚志外，其餘都不是蒲城在地人，而是渭南和商州人。1930年1月擔任蒲城特支書記的梁益堂，也曾參加渭南暴動，他也不是蒲城人，而是三原人。這些人有的只是為了逃避渭華暴動後的白色恐怖才暫時來到蒲城，所以變動較大。相較之下，「陝北黨的組織並沒有經過白色恐怖的摧殘」，「陝北過去沒有經過劇烈的鬥爭」，所以陝北特委成員的變動也比較小。²⁸

再進一步探究，表一蒲城縣級領導書記，除去黃平個人資料不詳外，其餘7人中，只有曹受祉一人是蒲城在地出身。²⁹至於委員，目前可以確定，

²⁷ 蒲城縣志編纂委員會編，《蒲城縣志》（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頁730；郭懷仁，〈回憶曹受祉及蒲城文化服務社〉，《蒲城文史資料》，第4輯（蒲城，1989），頁85-91。

²⁸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100、105。

²⁹ 黃平（黃若水）即前面提到1931年被提拔到陝西省委的黃平，樊德音則是韓城人，他

王菊人、亢伯毅、許尚志、王韻清、周至仁、李祥生都是蒲城人。沒有資料說明為何陝西省委偏愛任用外地人當蒲城縣級領導書記，但這裡要指出的是，相較於外來者擔任的書記更動頻繁，其他在地出身的成員則相對穩定。這不僅是因為在地幹部較熟悉當地環境，而且他們還在當地教育界任職，並結成一個菁英網絡。其中畢業於西北大學的王韻清，在 1926 年 8 月當上縣教育局長後，即透過其職位，為亢伯毅、王菊人等人安排小學教員的職位。另一位在 1930 年後長期擔任蒲城特支的周至仁，也曾先後擔任蒲城縣教育局督學、高小校長、縣民眾教育館館長、縣政府科長等職。這些人都是教育界上層的菁英分子，甚至可說是統治階級。而且據陝西省委的批評，這些蒲城特支的幹部，「過去只是注意在教育界的活動，或是學生的鬥爭」，卻沒有注意發動下層群眾鬥爭。³⁰這似乎也部分說明了何以這些在地幹部較為穩定了。

當然，陝西省委不希望蒲城特支「只是在教育界上層活動」，而要其多布置中心區域即鹽灘的鹽工和炭井礦工的工作，還有學生和士兵運動。³¹然

以教師職業為掩護，擔任蒲城特支書記。蒲城縣志編纂委員會編，《蒲城縣志》頁 353。又，當時有一位陝西安康縣出身的黨員也叫作黃平，又叫黃孝先，他在 1921 年考入北京大學，後來曾赴蘇聯東方大學就讀，1927 年回國後在西安教育界從事黨的秘密工作，日後曾被捕，獲釋後在抗戰期間曾在涇陽安吳青訓班教授馬列主義。但不確定此一黃平與陝西省委和蒲城特支的黃平是否為同一人。安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安康縣志》（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頁 881。

³⁰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 33。

³¹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 117。在蒲城縣西南有一處澇泊灘，又名澇陽湖，該處湖水富含鹽質，至遲從明朝以來即有民眾用澇水熬鹽私銷。但蒲城為山西官鹽銷區，故迄民國初年，官方仍舊禁止該處群眾私自熬鹽銷售。只是當地村民為了增加經濟收入，私熬私銷始終未停止。1924 年開始，有該處駐軍開始對蒲城境內鹽灘熬戶課稅。然而，可以想見，村民私熬私銷原來就是為了要逃避稅收，所以收稅此舉難免引起村民的反抗，當時中共即是以反稅為號召進行動員。又，熬戶不僅要受到當局的徵稅，還要向鹽戶主人租賃鹽場，加上熬鹽的成本高，熬戶常有破產之虞。當地村民也會被雇用，參與挑鹽土的工作。所以在蒲城熬販私鹽的事業中，也存在著複雜的剝削關係。關於澇泊灘熬鹽及其歷史的介紹可見：田武英，〈漫話澇泊灘和鍋板鹽〉，《蒲城文史資料》，第 4 輯（蒲城，1989），頁 132-138。

關於煤炭方面。蒲城縣北部一帶富含煤礦，煤質極佳，也已有 3、4 百年開採的歷史。民國時期即有私人開辦的煤礦公司在當地開採。蒲城縣志編纂委員會編，《蒲城縣志》，頁 224-225。

而，直到 1931 年 4 月，蒲城特支在其所擬定的計畫中，雖然自我批評的承認「黨是建立在知識分子基礎上(黨員成分知識分子占十分之八)，使黨的策略不能有正確的執行，黨的工作離開勞苦群眾」，但是計畫仍是突出「小學教師中的工作在蒲城更是必要」，黨要發起成立小學教師聯合會，吸收農村小學教師參加，成為小學教師爭取自身利益的中心組織。³²省委對此即批評，在農民鬥爭開始時雖然可以利用小學教師，但是農民鬥爭的中心領導是貧、雇農，而小學教師的社會成分是富農或富裕中農，這些階級在農民鬥爭劇烈的時候必然要起反革命作用，所以不應誇大小學教師的作用。³³省委在這裡實際上不僅否認了蒲城特支的計畫，還否定了特支的組成。

前面提到，在 1931 年 8 月前後，中央派劉少文來陝巡視。在劉少文的主導下，陝西省委和西安市委先後進行改組，加入了幾位工農幹部。但這些被提拔的工農幹部，能力缺乏，純粹是為了響應上面幹部工農化的要求才被提拔起來的。結果這些工農幹部不僅在實際工作上幫助不大，甚至還造成組織的破壞。

在蒲城也發生類似情事。在 1931 年 7 月底，蒲城縣召開代表大會。中央和省委巡視員也有參加此一大會。根據日後省委的批評，中央和省委巡視員犯了錯，因為他們決議發動群眾分糧食是蒲城黨目前唯一的鬥爭，卻放棄了反抗捐稅等其他鬥爭，而且幻想「拿一個傳單，七、八日內就要把全縣農民群眾轟動起來」，「結果什麼鬥爭都沒有領導起來」。³⁴

尤有甚者，在 1931 年 7 月底的代表大會後，蒲城縣委進行改組，由 2 位貧農，一位工人，兩位知識分子組成。這些被提拔起來的工農幹部中有一位叫麻俊卿者。據省委所言，他是「農民同志」，但是在「鹽所工人」中工作，這是有可能的，如前所述，當時蒲城鹵泊灘周圍的村民也會受雇參與挑鹽土等工作，所以麻俊卿有可能是農民也是工人幹部。當時中共正在動員鹽灘工人反對增加鹽稅，麻俊卿則是縣委交通員，也就是擔任聯絡工作。但是，麻

³²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376、384。

³³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390。

³⁴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551-555。

俊卿後來被捕叛變，並且供出整個鹽灘的中共支部，縣委負責人也被供出來，導致縣委垮台。麻俊卿事件就如同前述陝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的經歷一樣，是縣委為了呼應上層工農化的要求，並且是在外來特別是中央巡視員的主導下，形式的提拔工農幹部，又不給予以教育和分配工作，結果反而造成了組織的破壞。³⁵

九一八事變後，省委調了一位蒲城的農民到省裡接受訓練。這位農民是一位破產富農，省委認為他工作積極。這位農民回縣後，即擔任起縣委書記之職。根據當代《蒲城縣志》的記載，在1931年10月初，省委巡視員李良到蒲城巡視，成立了由李衝霄、鍾子盈、師致文3名為常委組成的蒲城縣委，因此那位「破產富農」應該是指李衝霄。李衝霄是從下層農民鬥爭起家的幹部。1930年蒲城特支書記黃平到該縣晉王村小學吸收教師為黨員，成立了黨、團支部。李衝霄即屬晉王村支部，1931年後他還曾擔任支部書記。當時李衝霄即因為領導群眾鬥爭村長，被軍警逮捕。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後，以李衝霄為領導的晉王村支部又領導該村一個有30餘人的「同心會」組織，發動「交農」圍城抗爭，因此獲得省委的讚賞。後來李衝霄也就被提拔為縣委書記。³⁶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蒲城縣的中共組織，也如同陝西省委、陝北特委等組織一樣，都是以國共合作時期即已入黨的菁英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為主。在1931年後，在上層的幹部工農化的要求下，蒲城黨也提拔了一些工農幹部，如農民兼鹽所工人麻俊卿。但如同陝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的例子般，這些被提拔起來的工農幹部，不僅能力有限，後來還背叛了黨，導致黨組織的破壞。當然，不是所有的「工農幹部」都是如此，如1931年10月擔任蒲城

³⁵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509、531、568-573；蒲城縣志編纂委員會編，《蒲城縣志》，頁354。

³⁶ 九一八事變前後，蒲城農民接二連三自發的發起數場「交農」圍城抗爭。「交農」又稱「擁堂」，是陝西農民集體攜帶農具和刀矛，向官府當局抗爭的行動。至少在清朝時期即已出現相關的文字記載。原志軍，〈蒲城農運史上的「交農」鬥爭〉，《蒲城文史資料》，第1輯（蒲城，1985），頁11-18；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I）》，頁261-262；中共蒲城縣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陝西省蒲城縣組織史資料（1926.冬-1987.10）》，頁21-22；蒲城縣志編纂委員會編，《蒲城縣志》，頁353。

縣委書記的李衝霄，他雖然是一位破產富農，但長期在下層帶領群眾進行鬥爭，有經驗也有能力，並且深得群眾的信任，和那些僅僅是因為工農出身而突然被提拔起來的幹部不同。日後省委特派員賈拓夫對李衝霄也有好的評價，說他對富平、蒲城、白水 3 縣的工作最清楚，建議在該 3 縣成立一個中心縣委，由李衝霄擔任書記。³⁷只可惜這位李衝霄因為日後叛變中共，所以找不到他的個人資料。³⁸

四、渭北三原武字區農民的自發抗爭和組織發展

事實上，由於農業歉收的緣故，除了蒲城以外，鄰近的富平等縣，在 1930 年代前期也爆發了許多自發性的災民抗爭，如陝西省委在 1931 年 4 月即指示富平特支注意災民工作。³⁹而且如同蒲城縣晉王村的同心會般，富平的災民抗爭也有自己的組織——窮人會。當時富平縣最高黨領導中共富平特支即計畫利用窮人會為中心，進行宣傳鼓動。⁴⁰根據陝西省委的說法，當時富平與蒲城曾一度同屬一個蒲、富縣委，而且富平除了一個城市支部外，餘皆農村支部。⁴¹只可惜即使是富平縣組織史資料也未記載當時富平縣農村支部的概況，以至無從知曉當時領導富平農村支部的有哪些幹部。⁴²

接鄰富平縣的三原縣的黨組織也是從農村鬥爭裡發展起來者，該縣的武字區後來更成為渭北革命根據地的中心。

三原縣在國共合作時期就成立縣委，1927 年 7 月國共分裂後到 1928 年

³⁷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1-3》(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94)，頁202。

³⁸ 李衝霄在1933年9月被捕叛變，並在隔月被陝西省國民黨省黨部派回蒲城，配合國民黨縣黨部破獲並逮捕中共蒲城縣委書記曹春生等17名黨團員，並使這些人登報脫黨。中共蒲城縣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陝西省蒲城縣組織史資料(1926.冬-1987.10)》，頁21。

³⁹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357。

⁴⁰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365-366。

⁴¹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509。

⁴² 中共富平縣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陝西省富平縣組織史資料(1926.5-1987.10)》(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頁15。

9月間三原縣委是由張性初(書記)、王雲、屈養正、賈子明、黃子文組成。這5個人也全是國民黨時期加入革命行列者，而且也全是知識分子。其中張性初同時還是陝西省委委員，他早年也跟隨魏野疇在西安、渭南、渭北各地活動，因此被委以重任。但是1928年三原、西安組織被破壞後，他就離開陝西，後來還脫離中共的組織關係。其他王雲、屈養正、賈子明3人日後也未再擔任三原縣組織的工作。

這5人當中，對於後來三原甚至整個陝西共產革命影響最大的是黃子文。黃子文於1909年生於三原縣陵前鄉甘澇池村的一個富裕家庭，其父黃銘是同盟會員，曾參加辛亥革命與討袁戰役。黃子文1925年在中學尚未畢業下即前往上海的中華職業學校就讀，隔年在上海入黨，1927年時還曾參加上海工人武裝暴動。暴動失敗後，黃子文報考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所以他既有在在外地革命工作的經驗，還曾受到軍事訓練和運動的洗禮，因此受到中共重用。國共分裂後，黃子文回到三原縣他的家鄉武字區活動。武字區位於三原縣北邊，國共合作時期即有喬國楨在當地組織農民協會，並成立黨支部。1928年4月前後，武字區的農民在黃子文的領導下發起交農圍城抗爭。另外，為了配合同年5月發動的渭華暴動，武字區也成立了以黃子文為總指揮的游擊隊。⁴³

有趣的是，在張性初擔任三原縣委書記期間，縣委所轄武字區支部、區委的幹部數量(6位)，竟然比縣委(5位)還多。⁴⁴這也可以看出武字區實際上是當時中共在三原縣活動的中心。其中擔任武字區支部與區委書記的孫平章，也是一位很值得注意的人。孫平章原籍湖北均縣，1904年隨雙親逃荒到三原縣定居，是貧雇農家庭出身的成員。1926年喬國楨成立武字區農協，他即被吸收加入農協。1927年春入黨。1928年4月，在黃子文的帶領下，三原農民發起「交農鬥爭」，圍攻縣城，孫平章也是領導人物之一。⁴⁵因此他被委以武字區委書記之職。另一位擔任武字區委委員的侯守愚，也和孫平章有同樣的

⁴³ 縣黨史辦，〈黃子文烈士生平活動簡述〉，《三原文史資料》，第3輯(三原，1987)，頁1-6；中國共產黨三原縣委員會編，《渭北革命根據地史》，頁469-470。

⁴⁴ 中共三原縣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陝西省三原縣組織史資料(1925.12-1987.10)》(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頁23-25。

⁴⁵ 縣委黨史辦，〈孫平章烈士簡傳〉，《三原文史資料》，第7輯(三原，1990)，頁77-86。

經歷，即 1926 年時加入農協，隔年入黨，1928 年參加交農鬥爭。其他幾位武字區委委員唐玉懷、王曲賢、李鴻儒、康德寬，也都是後來三原、渭北地區革命運動的重要領導者。其中唐玉懷還是 1926 年介紹喬國楨到武字區成立農協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如孫平章般的人物，他也是國共合作時期即加入革命行列者，但是他和前述陝西省委、陝北特委等組織的主要領導幹部不同，即他是下層農民出身者。而且他不是在上層的幹部工農化要求下突然被提拔起來的工農分子，相反的，他曾親身參與下層群眾鬥爭，是從鬥爭中浮現出來的群眾領袖。

在 1928 年 5 月發動的渭華暴動失敗以後，陝西省委，以及中共在渭南、三原等地的組織接連遭到破壞，原來由張性初擔任書記的三原縣委也全面改組，但是並未停頓。這次的改組也促進了三原黨進一步地方化。1929 年 10 月當陝西省委再派員恢復三原縣的組織時，即是由黃子文在其家鄉武字區成立三原特支，並由黃子文本人擔任書記，孫平章、唐玉懷擔任組織與宣傳委員。

後來黃子文在 1930 年嘗試發動一場軍事行動。大約在該年五卅前幾日，黃子文與陝西省委的西路巡視員陳雲樵到渭北討論工作，後者曾在鰲屋、武功等一帶發動鬥爭，失敗後即無法回去。黃子文等人於 6 月初在武字區孫平章家中成立了「渭北災民自救軍」，以分配地主豪紳糧食等口號為號召。另外，黃子文還「勾結」地方土匪。這些土匪頭子有書生出身者，還有黃子文過去的同學。這也許正是省委後來批評此一游擊運動是富農路線的原因。黃子文靠其私人關係動員土匪，但也因為這一層關係，當土匪部隊不聽指揮、任意劫掠時，黃子文不能果斷的予以解決。最後土匪張成義部叛變，收繳災民自衛軍的槍械，自衛軍因此潰散。在省委看來，這正是由於這場運動只是和土匪合作，以至流於單純的軍事行動，缺乏群眾基礎所致。⁴⁶

黃子文的經歷與行動，就如同周錫瑞所形容的劉志丹一般。兩人都是地方富裕家庭出身，都曾到黃埔學習，回鄉後也都利用其關係，拉攏動員地方

⁴⁶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172-173、213-227。

土匪等武裝團體起事。據省委所言，黃子文與劉志丹的做法在當時陝西地方黨間很普遍，「過去陝西任何一個地方黨部與黨員群眾都是想利用土匪發動群眾鬥爭，說土匪是革命的，因此即盡量與土匪上層領袖勾結」。⁴⁷但是，又與周錫瑞形容的劉志丹模式略有不同，黃子文的游擊行動雖然聯絡土匪，但終究是以武字區為根據地，中共在當地有穩固的基礎，而不是如劉志丹的隊伍般遊走各地，最後才在陝甘邊區找到落腳地。

在游擊運動失敗後，黃子文被派到北方局，由孫平章接任三原特支書記。1931年5月，三原特支改組為武字區委(又稱三原區委)，由馬先民(又叫馬德祿)擔任書記，孫平章任肅反兼財政委員，兼任赤衛隊大隊長。其他成員先後還有王曲賢、黃子祥、胡德潤、侯守愚、孫平章、孫銘章、黃子文。這位馬先民也是和孫平章相同，都是在1926年加入農協，隔年入黨的。而且馬先民還是孫平章的妹夫，所以他很可能和孫平章同樣都是下層農民群眾出身者。⁴⁸也如陝西省委所言，這些三原特支的領導幹部，「成分大半係貧農雇農」。⁴⁹

據陝西省委所言，在1931年8月前後，武字區的黨曾領導了一個反水利公債的鬥爭，獲得完全勝利，然後又繼續進行反印契稅、反區長的鬥爭。而且當地也成立了類似蒲城縣晉王村同心會和富平縣窮人會般的群眾組織，即農民聯合會。只是農民聯合會只是個名義，實際上並不存在組織形式。同時當地黨員也不是透過黨的支部去領導，而只是以個人的名義去領導。⁵⁰由此可見，當地農民鬥爭帶有很強的自發色彩，農民實際上是由農民領袖而不是黨發動起來的，用中共的術語來說，這就是「個人英雄式的領導」。

迄此可以發現三原黨表現出和上述陝西省委等組織不太一樣的特質。雖然三原和陝西各地的組織一樣，一開始都是由國共合作時期即入黨的知識分子幹部為主，但三原的這些知識分子幹部很早就開始參與下層群眾鬥爭，過程中也吸收了許多下層農民出身的幹部。無論是那些菁英家庭出身的知識分

⁴⁷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217。

⁴⁸ 中國共產黨三原縣委員會編，《渭北革命根據地史》，頁477-478。

⁴⁹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509。

⁵⁰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頁552-553。

子幹部，還是下層農民出身的幹部，他們都曾經歷鬥爭的洗禮，並且是在當地群眾間甚有威望的農民領袖，前述蒲城的李衝霄也具有同樣特質。這些幹部和前述由中央巡視員為了滿足上層幹部工農化的要求而強硬提拔起來的工農幹部，不可同日而語。這也部分說明了為何中共後來可以在三原、蒲城等渭北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

五、陝甘游擊隊與渭北革命根據地的建立

當然，自發的農民暴動不等同於共產革命。農民自發暴動的目的可能只限於分富戶的糧，或是交農抗爭，即包圍縣城，有時甚或會流於土匪式的劫掠。但是，自發的農民暴動不會如中共所期望般進行分配土地，更不會建立起蘇維埃政權，除非給予其有組織的領導。

周錫瑞所探討由劉志丹等人所領導的著名的陝甘游擊隊一開始就是一支缺乏黨組織領導的自發性農民武裝隊伍。根據陝西省委的分析，陝甘游擊隊主要由3個部分組成：來自山西由中共領導的一支游擊隊，和山西游擊隊有關的販賣鴉片煙土的史桂吉部，以及由劉志丹所率領在陝北一帶活動的武裝隊伍。後兩支隊伍原來就是由土匪組成，第一支隊伍雖然與中共關係較密切，但也以「好土匪」著稱。⁵¹

這3支隊伍在1931年10月前後於陝甘邊一帶會合。隔月，隊伍開到隴東慶陽的新堡一帶，接受隴東軍閥陳桂璋部的收編。陝西省委也在12月派人與部隊聯繫。隔年1月，陝西省委軍委書記高維翰在柘邑特支書記第五伯昌的陪同下來到部隊，部隊即於隔月正式改組為西北反帝同盟軍，由謝子長、劉志丹任正、副指揮。幾天後，隊伍開到正寧縣三嘉原，再度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依舊由謝子長和劉志丹擔任正、副指揮，並由高維翰擔任政委。⁵²

當高維翰抵達部隊時，他也向部隊傳達了省委希望他們向三原一帶渭北

⁵¹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I)》，頁200-201。

⁵² 任學嶺，《陝甘革命根據地史》，頁107-113。

地區靠攏的指示。⁵³這正是因為當時中共在陝西農村中最有基礎的，就是以三原武字區為中心的渭北地區。陝西省委在給中央的計畫中，也是打算「抓緊渭北群眾鬥爭高漲的情緒」，配合游擊隊的發展，建立以三原武字區為中心的蘇維埃根據地。⁵⁴

然而，從接下來陝甘游擊隊的行動看來，部隊似乎並沒有以向渭北發展為唯一目標。部隊在 1932 年 2 月占領了栒邑縣的職田鎮後，又抵達耀縣的照金鎮，以後又進入香山進行了幾天的休整。隨後部隊來到宜君縣，3 月初又開到中部縣。3 月下旬部隊又開到正寧縣，並先後進行了兩次攻城(山河鎮)的行動，皆以失敗告終。4 月中旬，游擊隊出其不意的突然攻占了栒邑縣城，但旋即又撤出到馬家堡一帶。⁵⁵

正是在這時候，陝西省委書記杜衡來到部隊當中。杜衡就是當時省委中積極主張部隊開到渭北地區的人。所以部隊遲遲未向三原進發，令杜衡非常生氣。他痛斥隊伍不開到「敵人的腹心地區」三原，而是跑到香山、宜君等深山裡靜養。更令杜衡憤怒的是，游擊隊缺乏政治工作，也不重視群眾動員，部隊的行動主要是為了錢，如攻打正寧縣城就是為了「打開城弄錢」。事實上，部隊就是靠「月餉 20 元」維持的，如果不發餉，就可能發生攜槍潛逃，乃至叛變的情事。究其實，陝甘游擊隊仍是一隻土匪性極強的隊伍，甚至在隊伍行軍的過程中，也不免發生搶掠的情事。杜衡認為要改變此一狀態，最重要的就是要改變隊伍的成分。這就使得隊伍開往三原更加迫切，因為中共在三原有群眾基礎。游擊隊若開到三原，不僅可以幫助當地農民鬥爭，建立渭北蘇區，同時還可以吸收大批農民進入游擊隊，藉此改造游擊隊的成分，可謂一舉兩得。⁵⁶

隨後杜衡即以游擊隊總指揮謝子長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為由，撤銷其總指揮的職務，改派到甘肅靖遠做兵運。同時杜衡還把游擊隊改編為第三和第五兩個支隊，分別由劉志丹、閻紅彥擔任兩隊的支隊長，並由高維翰、黃

⁵³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 (I)》，頁49。

⁵⁴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 (I)》，頁134。

⁵⁵ 任學嶺，《陝甘革命根據地史》，頁115-118。

⁵⁶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 (I)》，頁202-214。

子文擔任兩隊的政委。其中第五支隊即南下三原的武字區。⁵⁷

也是為了迎接陝甘游擊隊的到來，陝西省委自從 1932 年初以來即開始積極介入渭北地區各地方的黨務。在該年的 2 月，省委巡視員焦維熾即和黃子文一同到達武字區。黃子文即前述 1930 年領導三原武字區災民鬥爭的群眾領袖。在該次鬥爭失敗後，黃子文赴天津北方局，後又被北方局派到晉西游擊隊工作，並隨隊進入陝北與劉志丹部會合，所以黃子文當時原來是在陝甘游擊隊裡。前述 1931 年 3 月陝西省委接受六屆四中全會的決議，並開除了包括黃子文在內幾位黨員的黨籍，但當時黃子文可能不在省委，至少從後來事態的發展看來，黃子文並未被開除黨籍。而根據游擊隊報告，前述游擊隊在 1932 年 2 月進入香山休整，就是某位「黃同志」的提議，其目的是希望游擊隊在香山休整後，繞過柳林、耀州，一直到三原。在休整幾天後，游擊隊即派「黃同志」到耀州找組織，只是「黃同志」一去不返，所以游擊隊後來才轉向宜君一帶活動。⁵⁸此一黃同志推測應該就是黃子文，他可能就是在此時離開隊伍回到武字區。

焦維熾與黃子文在 1932 年 2 月來到武字區後，即在長坳堡辦理一個訓練班，教地方黨員進行游擊。3 月，武字區成立了一支游擊隊，由孫銘章擔任隊長。隔月，原在陝甘游擊隊擔任政委的高維翰也來到武字區召開會議，決定由當時三原縣最高黨領導武字區委的武裝委員黃子祥(黃子文之兄)負責組建武字區游擊大隊，大隊長仍由孫銘章擔任，下轄 3 支分隊，分別由鄧萬祥、康尚武、王化海擔任隊長。⁵⁹焦維熾、黃子文與高維翰等陝甘游擊隊領導幹部先後來到武字區活動，正是為了預備陝甘游擊隊的到來。

如前所述，省委把陝甘游擊隊拉到渭北地區，原是想藉由加入當地的農民群眾，改造游擊隊。不過，就在游擊隊到來前後，改造渭北地區特別是三原武字區的組織領導，反而成為省委關懷的重點。原來省委書記杜衡，在第五支隊南下抵達武字區前，似乎也曾到過武字區。當時他對於作為三原黨最

⁵⁷ 任學嶺，《陝甘革命根據地史》，頁 118。

⁵⁸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 (I)》，頁 126-127。

⁵⁹ 任學嶺，《陝甘革命根據地史》，頁 130；中共三原縣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陝西省三原縣組織史資料(1925.12-1987.10)》，頁 36。

高領導武字區委的領導成員極其不滿，批評這些人是「老黨員」、「老布爾什維克」，他們不領導群眾鬥爭，只是號召群眾盜墳，然後分贓，以至失去群眾的信仰，更遑論這些老黨員中還有地主豪紳了。杜衡指的老黨員就是前述的孫平章、孫銘章諸人。如前所述，孫平章、孫銘章兄弟以及武字區等其他幹部，許多是下層農民群眾出身，但是因為他們長期擔任武字區與縣委的領導，難免成為尾大不掉的老黨員，或說老幹部更貼切，招致省委的嫉視，特別是如孫平章、孫銘章等在當地群眾、幹部間甚有威望的領袖人物。為此，杜衡當下即撤銷了所有武字區委的委員，僅保留貧農馬先民為書記，以及另一位他認為是三原農民領袖的黃子文。⁶⁰儘管這兩人也是在當地有長久歷史的老幹部。

1932年4月陝甘游擊隊第五支隊果然來到了武字區，但並沒有待很久。因為游擊隊的到來立即引來敵軍的圍剿，第五支隊旋即撤離武字區，時任第五支隊政委的黃子文也隨隊撤離。而敵軍的圍剿進一步促進武字區黨領導的重組。同年4-5月間，武字區委書記馬先民被捕，其他委員包括侯守愚、王曲賢、孫太章、張樹宏等亦被逮捕。5人在同年被解至西安城，遭到殺害，只有張樹宏負重傷，倖免於難，逃回根據地。6月，已經被撤下陝甘邊游擊隊政委一職的高維翰作為省委巡視員來到武字區，見武字區委因前書記、委員被捕而不健全，乃指定孫海章為區委書記。兩個月後，高維翰再以孫海章右傾，犯了富農路線、尾巴主義的錯誤，將其撤職，改選舉孫銘章為書記，胡德潤、趙應奎、鄧萬祥、孫平章為委員。⁶¹

然而，孫銘章、孫平章與甫被撤職的孫海章原來是兄弟，其中孫銘章更是一位令陝西省委頭痛的人物，當時陝西省委甚至戲稱他為「帝國」，指控其反對土地革命，還說群眾罵他是武字區的皇帝。如前所述，孫銘章是武字區游擊大隊的大隊長，他曾下命令「一個游擊隊員出發都要有我的私章，不然以軍法從事」。也正是因為孫銘章尾大不掉、不服從省委的緣故，1932年

⁶⁰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I)》，頁254-255；
中共三原縣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陝西省三原縣組織史資料(1925.12-1987.10)》，頁26。

⁶¹ 中國共產黨三原縣委員會編，《渭北革命根據地史》，頁176-177、202-203。

7月省委再改組武字區委為三原縣委，由金理科取代孫銘章任書記，黃子文、趙應奎、馬宗德為委員，他們也全是三原在地人，其中金理科與馬宗德被陝西省委認為是群眾中最好的領袖。⁶²

另外，原來由孫銘章擔任大隊長的武字區游擊大隊，也在同年8月被改編為渭北游擊隊，由馬志舟擔任隊長，金天華擔任政委。馬志舟和新上任三原縣委書記的金理科，以及委員馬宗德，都是武字區人，其中馬志舟還曾擔任南原支部的書記，馬宗德則是由金理科介紹入黨。⁶³至於擔任政委的金天華是甘肅榆林人，曾在馮玉祥、楊虎城部當兵，後投入陝甘游擊隊活動，1932年7月因傷離開部隊，隨後即被陝西省委派到三原加入渭北游擊隊。從這一連串的改組看來，陝西省委是有意提拔武字區下層群眾出身的新幹部，還有調動外來幹部，取代孫銘章等長期掌握武字區領導的老幹部。

但是，孫銘章等老幹部不是那麼容易被取代。根據三原縣組織史資料的記載，三原縣委下轄的武字區委事實上仍由孫海章、孫銘章於1932年7-10月間先後擔任區委書記，並由孫平章擔任區委肅反委員兼財政委員。所以孫氏兄弟在武字區仍有相當大的勢力，甚至擁槍自重，不願意把槍交出來。⁶⁴原來馬志舟、金天華等人領導的游擊隊，也是由孫銘章提供槍枝。⁶⁵可見孫銘章雖然不再擔任游擊隊領導，但是他對游擊隊仍有一定的影響力。

孫銘章等老幹部所以不容易被取代，也許是因為省委從武字區當地提拔起來的新幹部，如金理科，他也是本地人，而且也是很早從1927、1928年就開始投入當地群眾鬥爭，即他本身也和孫銘章等人相同，都是資深的老幹部。

⁶²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II）》（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94），頁283-285、298。

⁶³ 馬宗德，〈政治保衛隊的建立及其活動〉，「延安紅雲」：
<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7643.html> (2021/12/8點閱)。

⁶⁴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II）》，頁289。

⁶⁵ 據金天華的回憶，省委要他到三原武字區的一個中藥舖找孫「帝國」即孫銘章。當他到三原找到孫銘章後，後者又把他介紹給他的掌櫃黃子文。當時黃子文正在組建游擊隊，就把金天華留了下來。金天華，〈渭北游擊隊的一些情況〉，「延安紅雲」：
<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7639.html> (2021/12/8點閱)。另一位游擊隊成員張述升也提到孫銘章提供他們槍支。張述升，〈武字區革委會及武裝鬥爭〉，「延安紅雲」：
<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7635.html> (2021/12/8點閱)。

事實上，省委對於7月成立由金理科等人領導的三原縣委也很不滿意，指控三原縣委「表現了最嚴重的機會主義的動搖」，特別是拒絕土地革命的要求，三原縣委領導甚至認為農民沒有土地的要求。而在9月22日成立的由黃子文擔任主席的渭北革命委員會(又稱原富耀革命委員會)，也沒有立即實行沒收與分配土地的工作，省委因此要求革命委員會立即沒收武字區地主、豪紳、富農、祠堂、廟宇的土地。⁶⁶

綜上所述，陝西省委雖然不滿三原武字區孫銘章等老幹部，並嘗試從當地提拔新幹部取而代之，但結果孫銘章等人依舊在當地發揮影響力，由省委提拔起來的新幹部既不能取代老幹部，其所組成的三原縣委也對於執行省委的政策採取妥協態度。然而，陝西省委當時很迫切需要打破此一僵局。因為省委在1932年10月提出創造渭北新蘇區的中心任務。此一任務的完成，並不是依賴外來的陝甘游擊隊，而是主要依靠當地群眾的力量完成。所以省委更迫切需要發動群眾鬥爭，貫徹土地革命，掌握地方武裝，好建立起新渭北蘇區。⁶⁷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省委派遣越來越多的外來幹到渭北地區擔負起領導責任。

六、外來幹部包辦下的渭北革命根據地

為了建立渭北新蘇區，陝西省委於1932年10月初成立渭北特委，負責領導三原、富平、蒲城、耀縣、白水等地的組織。⁶⁸特委機關設在武字區，由高維翰擔任書記，李衝霄、黃子文、汪鋒、程建文擔任常委。其中高維翰、汪鋒並不是渭北在地人，而是長安和藍田人，他們是前任與現任省委委員，是作為省委的代表參加特委。另外3位，李衝霄是蒲城人，黃子文是三原人，程建文是富平人，他們是渭北地方黨的代表。由省委派來的幹部擔任渭北特委的領導，已足以表達省委想要掌握地方黨的意圖。

⁶⁶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II)》，頁127-128、133-134。

⁶⁷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II)》，頁158-175。

⁶⁸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II)》，頁191。

高維翰等新的渭北特委領導亟欲貫徹土地革命政策，其中在武字區的中心南原一帶即完成了土地分配，高維翰認為「南原群眾非常積極和勇敢，就是因為執行了土地革命的任務」。其他地區也已經在進行中。至於「帝國」即孫銘章的問題，特委決議要開除「帝國」和前區委委員鄧萬祥的黨籍，並立即逮捕「帝國」，召集群眾法庭予以審判，其他前區委委員如黃子祥、孫平章則是留黨察看，這些人都是武字區資深的老幹部。特委委員程建文甚至主張在 11 月 7 日召開的十月革命紀念群眾大會上逮捕「帝國」，但高維翰不同意，主張應該經過渭北革命委員會去逮捕。然而，擔任革命委員會主席的黃子文遲遲沒有執行逮捕孫銘章的指示，連收繳孫銘章的槍也沒有做到。⁶⁹黃子文的猶豫，與他本人也是武字區的老幹部，而且還與孫銘章等人是長期的戰友，不無關係。據孫海章的回憶，高維翰想要殺孫銘章，因為黃子文不同意，才得以倖免。不過後來在一場群眾大會上，高維翰即當眾宣布開除孫銘章的黨籍，由趙應奎接任武字區委書記。⁷⁰據趙應奎的回憶，他是 1932 年春參加黃子文、孫平章、孫銘章等人在武字區領導的群眾分糧鬥爭，才參加共產黨的，所以他是一位在地出身的新幹部。⁷¹中共文件中稱趙應奎為小商人，有人戲稱其「貨郎」，可以推測趙應奎應該是遊走在底層農村間的行商小販。⁷²不過，根據三原縣組織史資料的記載，武字區委書記早在 1932 年 10 月即由劉林生取代孫銘章，趙應奎是 12 月才取代劉林生為書記。

特委後來甚至指控孫銘章、黃子祥等前武字區黨和游擊隊領導進行「反革命的陰謀」，在其所在的義和村成立革命委員會，其中也設立財政、肅反、軍事、土地等部門，還組織了游擊隊，準備到耀縣照金鎮東南游擊。庇護孫銘章等人的黃子文也因此被特委指控，在「對於兩條路線鬥爭上，不堅決和

⁶⁹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II)》，頁255-256、268-269、289-290。

⁷⁰ 孫海章，〈武字區革命鬥爭回憶〉，「延安紅雲」：
<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7638.html>(2021/12/8點閱)。

⁷¹ 趙應奎，〈武字區革命鬥爭片斷〉，「延安紅雲」：
<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7641.html>(2021/12/8點閱)。

⁷²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II)》，頁297-298；劉林生，〈三原地下黨的一些情況〉，「延安紅雲」：
<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7663.html>(2021/12/8點閱)。

動搖」等等。⁷³後來黃子文在 1932 年 12 月時，因為關於紅四方面軍入陝後的陝西局勢，與前來武字區巡視的省委杜衡發生分歧，因此遭到停止一切職務的處分。⁷⁴

迄此為止，長期掌握三原武字區領導的老幹部，紛紛遭到撤職或開除出黨等處分。其所留下的空缺，首先是由外來幹部所占據。如前述 1932 年 10 月成立的渭北特委即是由外來幹部高維翰擔任書記。另一位同樣是外來幹部的特委委員汪鋒當時是省委軍委書記。汪鋒和高維翰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有軍事經驗。汪鋒是藍田人，他在國共合作時期即加入革命行列，1930 年時正是在陝西省委書記高維翰的指示下，他被派到楊虎城主政的陝西省政府衛士營幹部訓練班開展兵運工作，並學習掌握軍事技術，1931 年才被調回省委軍委工作。⁷⁵據汪鋒的回憶(有趣的是，汪鋒說他才是渭北特委書記)，在他抵達渭北後，省委還陸續派人到三原地區，包括被派到游擊隊的劉玉琨(李平、劉傑三)、鄭彥青、劉庚、趙啟明、王傑等，以及在汪鋒之後到來的幹部賈拓夫、師克壽、周鳳鳴(程建文之妻)、于世莊等人。⁷⁶其中賈拓夫當時還是省委委員。

除了外來幹部外，武字區老幹部所留下的空缺還由外來幹部所提拔起來的在地工農幹部填補。如汪鋒所提到的賈拓夫是在 1932 年 11 月被陝西省委派去渭北地區巡視，並肩負撤換高維翰、黃子文的任務，以及提拔新的貧雇農成立特委。⁷⁷原來當時省委不僅不滿意黃子文等地方幹部，也認為高維翰等特委領導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⁷⁸賈拓夫後來也成立了由李衝霄、鄭彥青、汪鋒、金理科、顧先臣 5 人組成的特委，由李衝霄任書記。這位李衝霄就是

⁷³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 (II)》，頁277。

⁷⁴ 中國共產黨三原縣委員會編，《渭北革命根據地史》，頁211。

⁷⁵ 許發宏，《秦嶺之子：汪鋒革命傳奇》(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頁34-38。

⁷⁶ 汪鋒，〈渭北革命鬥爭的一些情況〉，「延安紅雲」：

<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7653.html>(2021/12/8點閱)。

⁷⁷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 (II)》，頁327。

⁷⁸ 陝西省委所指控高維翰犯的機會主義錯誤，包括：渭北革命委員會中完全沒有保障無產階級的骨幹與領導；在分配土地方面，沒有徹底深入階級鬥爭，對富農一再讓步；游擊隊中包含了許多富農分子和土匪流氓等等。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1-3》，頁179-182。

前述蒲城縣從下層農民鬥爭起家的幹部。12月，省委領導杜衡又來到武字區，前述黃子文與杜衡發生爭執而被撤職，正是在這個時候。當時杜衡還改組了渭北特委，改以金理科為書記，金理科即前述被省委稱為最好的群眾領袖。⁷⁹另一位委員顧先臣則是在1932年9月到1933年8月間擔任武字區雇農工會主席，是雇農出身。他們都是被賈拓夫特別提拔起來擔任特委領導的貧雇農幹部。

1932年12月中旬，賈拓夫根據陝西省委的決定，在武字區召開渭北特委擴大會議，宣布取消渭北特委，成立三原中心縣委，由劉林生擔任書記，孫金鈞、曾楚川、趙應奎、王金彥擔任常委，馬志舟、顧先臣擔任委員。其中劉林生是武字區人，成分是雇農，他和孫金鈞是從農民中選拔出來的貧雇農幹部。⁸⁰趙應奎是前述被提拔起來取代孫銘章擔任武字區委書記者，馬志舟則是前述1932年8月編成的渭北游擊隊隊長，他也是三原在地農民出身。

1933年1月，陝西省委再調整三原中心縣委成員，由書記劉林生、副書記兼組織委員汪鋒、宣傳委員孫金鈞、軍事委員閻文必、秘書余海豐組成常委會。其中閻文必經歷不詳，余海豐則是長安人，早年曾在北京、上海讀書，1930年後先後在楊虎城部隊以及陝南地區從事工作，所以他不僅是外來幹部，還是軍隊出身的幹部。

據汪鋒所言，省委所以提拔雇農劉林生起來擔任中心縣委書記，純粹是「當時因執行『左』的一套，提拔農民上來當縣委書記」，實際上仍是由汪鋒等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說了算」。⁸¹另一位貧雇農出身的中心縣委孫金鈞也是個「空架子」，他後來回到武字區。武字區黨員問他在縣委做什麼，他回答說「吃了逛，逛了吃」。以後他去哪裡了，人也找不到。這些被提拔起來的貧雇幹部，能力甚有問題。當時到武字區巡視的省委巡視員即發現武字區委全是農民幹部，亟需要知識分子幹部的幫助，因此請求省委派秘書等來幫助武字區委的農民幹部。⁸²事實上，劉林生在1932年10月被提拔起來擔

⁷⁹ 中國共產黨三原縣委員會編，《渭北革命根據地史》，頁209-210。

⁸⁰ 趙伯平，〈中共三原中心縣委的工作情況〉，「延安紅雲」：
<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7664.html> (2021/12/8點閱)。

⁸¹ 汪鋒，〈渭北革命鬥爭的一些情況〉，「延安紅雲」：
<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7653.html> (2021/12/8點閱)。

⁸²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1-3》，頁141-142。

任武字區書記時，秘書就是由外來的陝北籍幹部李俊藻擔任。可以想見從那時開始，劉林生就只是個傀儡了。據劉林生所言，他在 1933 年 3 月一度被捕，遭到拷打，但他沒有自首，也不承認是共產黨。5 月獲釋後，劉林生就回家務農，沒有再參加革命工作了。⁸³

因為由地方上提拔起來的農民幹部只是傀儡，實際權力掌握在外來知識分子幹部的手中，後者的領導與壓制地方幹部的作風，也引起地方幹部的不滿。如武字區自 1932 年 10 月以來先後由劉林生、趙應奎等地幹部領導，實際上權力卻是掌握在擔任秘書的外來幹部李俊藻手中。當時省委的一份報告即提到，武字區的工作是「區委李包辦」，這裡的李指的應當就是李俊藻。當時武字區工作停頓，三原中心縣委派了某位叫作「文」的幹部和「李」一起去武字區工作。這個「文」筆者推測應是當時擔任共青團三原中心縣委委員的程建文，事實上李俊藻也是團中心縣委委員。程建文即前述 1932 年 10 月被提拔起來擔任渭北特委的委員，他是渭北地區富平人，卻對於武字區的老幹部不滿意，甚至曾主張逮捕孫銘章。⁸⁴而這位幹部「文」也對武字區有很多批評，他說武字區的群眾領袖即渭北革命委員會的主席黃子文有陰謀，想把游擊隊帶到北山區。當時三原中心縣委還想逮捕孫 XX 同志，槍斃 XXX 同志，這指的應該就是前面提到的孫銘章，即「帝國」。然而，黃子文、孫銘章雖然被外來幹部撤職，他們在地方上仍有相當影響力。武字區群眾對於幹部「文」的批評還有縣委想要槍決孫銘章的作法很不滿，認為這都是省委主導的(他們認為「文」是代表省委的)，還有地方黨員說：「叫他們(省委)再弄，看我不敢把他們刺了」。⁸⁵

另一位外來幹部金天華則指控黃子文的哥哥黃子祥，說他把武字區某個支部的成員半夜拉去，威脅說上頭命令黃子祥把他殺了，但是黃子祥對這個人說「因為我們都是本地的人，放了你」。金天華指控黃子祥藉此破壞這個支部。金天華還指控孫銘章、孫平章、鄧萬祥等前武字區領導，說他們在群

⁸³ 劉林生，〈三原地下黨的一些情況〉，「延安紅雲」：
<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7663.html>(2021/12/8點閱)。

⁸⁴ 程建文於1933年被捕叛變。

⁸⁵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1-3》，頁106、132。

眾間散布謠言「共產黨叫我們作工作，工作好他們來把我們開除了」，又對舊的幹部說「你看把你都改組了，不要了」。這些謠言實際上就是抱怨外來幹部對孫銘章等老幹部的排擠甚至迫害。⁸⁶不論孫銘章等人是否如金天華所謂有從事反革命的陰謀，但是孫銘章等人的說法確實有部分事實。

七、涇陽的苗家祥部

周錫瑞在《意外的聖地：陝甘革命的起源》一書中主要是探討劉志丹等人領導的武裝隊伍與陝甘邊區，其中也有部分提到渭北革命根據地，但篇幅並不多，而且其中有相當部分是談渭北革命根據地涇陽縣的苗家祥部，並把該部描繪成一支土匪武裝。如該部曾綁架過中國華洋義賑會救災總會派到陝西的一位挪威籍工程師，周錫瑞就利用當時的報紙與外文材料，把苗家祥描繪成一個噴雲吐霧、大抽鴉片的「臭名昭著的罪犯」。⁸⁷那麼，實際的情形是如何呢？

苗家祥是涇陽本地人，富農出身，家中有商號數所。1924年時苗家祥進入縣立第二高小就讀，受到進步思想影響，1926年加入共青團，隨後即投入農民運動，曾擔任農民自衛團團長，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苗家祥在地方上具有一定的影響力。1928年苗家祥曾領導農民進行「交農」鬥爭。根據當時中共內部報告，苗家祥後來又去馮玉祥部當兵。⁸⁸而根據同時代人日後的回憶，苗家祥部是在1931年臘月間從楊虎城的警衛團譁變出來的。⁸⁹由此可見，苗家祥匯聚了早期中共陝西幹部的各種特質，即在地菁英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國共合作時期即已入黨，並且具有軍事經驗，還是地方群眾領袖，曾領導地方農民進行抗爭，頗似前述武字區的老幹部。

不過苗家祥也和三原武字區的老幹部一樣，遭到陝西省委和外來幹部的

⁸⁶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1-3》，頁205-206。

⁸⁷ 周錫瑞，《意外的聖地：陝甘革命的起源》，頁174-175。

⁸⁸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4-1936》（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94），頁1。

⁸⁹ 苗作魁、張星煥，〈苗家祥與涇陽游擊隊〉，「延安紅雲」：
<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7657.html> (2021/12/8點閱)。

質疑與打壓。大約在 1932 年 8 月前後，苗家祥部配合武字區的渭北游擊隊攻打馬額鎮的民團王茂臣部。同年底，省委也派來了趙啟明、劉清和、蔡春堂、張世凱等共產黨員到苗家祥部充實力量。⁹⁰如前所述，也是在同一個時期，省委開始派遣大量幹部到三原武字區，改組地方黨部，取代孫銘傳等老幹部。也如同在武字區般，外來幹部也和苗家祥的部隊處得很不好。1933 年 1 月，三原中心縣委將武字區的渭北游擊隊和涇陽的苗家祥部，分別編為渭北游擊隊的第一和第二大隊。三原中心縣委也派了幹部到苗家祥部，但是這些外來幹部，「完全是官僚主義的行動，命令式的領導」，甚至向部隊要洋 3 百元，且令其必須完全繳清。苗家祥部因此與黨之間存在隔閡，形成嚴重的問題。⁹¹

外來幹部與三原中心縣委對苗家祥的壓榨與質疑，即使是中心縣委派到該部的巡視員也為該部抱屈。根據一份巡視員的報告，苗家祥部的成分一開始是土匪，但是在殺了一個土匪領袖，以及慢慢的將異己分子排斥出去後，貧農成分已達到十分之七，另有十分之一的雇農，然後就是士兵。儘管苗家祥部仍不脫土匪行徑，但該部不單純只是土匪武裝，在地方上也有群眾基礎。又，該隊由三個分隊組成，第一分隊侯振西是一同從楊虎城警衛團譚變出來的班長，是「赤色群眾」；第二分隊是吳世昌；第三分隊張培述。根據張培述的自述，他是中農出身，工人之子，1927 年投入農運，後來在家從事木匠。因為成分好，當時中心縣委安排張培述接受短期的訓練，然後委派他擔任該部隊的政治委員。所以根據這位巡視員的看法，苗家祥部的成分還算不錯。⁹²

再者，根據這位巡視員的說法，三原中心縣委先前派到苗家祥部的某位代號「白郎」的巡視員作風極差，向部隊的黨員公開的說「我吃不了苦，要吃很好的東西」等等。而中心縣委過去對苗家祥部的領導也是完全忽視與放棄。中心縣委除了要苗家祥部一個月給縣委 3 百元款子外，還不究其實的懷

⁹⁰ 苗作魁、張星煥，〈苗家祥與涇陽游擊隊〉，「延安紅雲」：
<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7657.html> (2021/12/8 點閱)。

⁹¹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1-3》，頁 92-93。

⁹²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1-3》，頁 115；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4-1936》，頁 1-2。

疑該部「根本有問題，有反革命的陰謀」，並致信涇陽特支，要後者不要承認苗家祥部，並且馬上開除該部的所有黨員。中心縣委還質疑該部兩名失蹤的黨員是被苗家祥暗殺了，結果證實該 2 名黨員並未失蹤。⁹³

根據另一位外來幹部劉映勝的說法，當時三原中心縣委批評苗家祥部以及威脅要開除該部黨員，還有前述中心縣委要槍決武字區孫銘傳等指示，全都是當時縣委委員曾楚川個人一手包辦所致。⁹⁴如前所述，1932 年 12 月省委特派員賈拓夫成立了由劉林生擔任書記，孫金鈞、曾楚川、趙應奎、王金彥擔任常委，以及馬志舟、顧先臣擔任委員的三原中心縣委。這幾個人中，除了王金彥的來歷不詳外，劉林生、孫金鈞、趙應奎、馬志舟、顧先臣都是被提拔起來的在地幹部。至於曾楚川，他在 1930 年時曾在楊虎城部新編十四師南陽教導隊中的中共軍事委員會擔任委員。據同時在南陽教導隊第一中隊的孫作賓的回憶，該中隊的黨支部書記曾楚川，又名曾楚雲，是湖北人。所以曾楚川不僅是外來幹部，因為楊虎城部新編第十四師的黨組織直屬上海中共中央，所以曾楚川還可能是中央派來的軍事幹部。⁹⁵

至於曾楚川包辦三原中心縣委一事，不只劉映勝如此批評，之前擔任渭北特委書記的金理科也曾批評「無聊分子」曾楚川包辦三原中心縣委的工作，想要調換曾楚川。但是省委特派員賈拓夫則說曾楚川能幹，是政治上的骨幹。⁹⁶金理科、賈拓夫兩人對曾楚川的看法不同，與金理科是地方出身的幹部，主要在地方工作，賈拓夫則是陝西省委幹部，所以難免會替外來幹部說話，不無關係，況且曾楚川當時應當也是由陝西省委派到三原中心縣委工作。而曾楚川所以可以包辦三原中心縣委，如前所述，正是因為縣委書記劉林生、組織部長孫金鈞，是陝西省委特意提拔起來的貧雇農幹部。他們沒有能力，只是個「空架子」，結果還是外來幹部說了算。⁹⁷

也因為賈拓夫為曾楚川說話，所以雖然曾楚川包辦的三原中心縣委和縣

⁹³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1-3》，頁112-115。

⁹⁴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1-3》，頁140-141。

⁹⁵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回憶資料卷1923-1936)》(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頁131、659。

⁹⁶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1-3》，頁96。

⁹⁷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1-3》，頁141。

委特派員可能在領導苗家祥部上犯了錯誤，賈拓夫卻批評苗家祥部，「完全是苗一個人英雄的領導，他們執行單純的軍事行動與土匪路線，不作群眾工作」，儘管賈拓夫也承認苗家祥部的成分好，大部分是貧雇農和苦力。賈拓夫的立場反映了他比較傾向省委和外來幹部一方，他不僅稱讚包辦三原中心縣委的曾楚川很能幹，是政治上的骨幹，對於前述被批評包辦武字區委的區委秘書外來陝北籍幹部李俊藻，賈拓夫也讚許他是「得力秘書」。⁹⁸

另一位巡視員潤評也承認農民對苗家祥部的信仰很深，和苗家祥有關係的居多數，但這反而讓中共感到不安。因為中共根本不信任苗家祥，認為苗家祥以「張同志」（應是指由三原中心縣委提拔起來擔任該部政治委員的張培述）有陰謀，將後者趕出，還說苗家祥拉攏地方士紳。所以該巡視員就建議，雖然現在發動群眾分糧，需要苗家祥部武裝幫助，但是中共根本不認定苗家祥部是他們的武裝。所以要設法分化苗家祥和在該部的黨員間的關係，將苗家祥的反動面目暴露在黨員面前，然後再奪取該部的群眾。⁹⁹

苗家祥也已經發覺中共實際上並不信任他，根據曾在該部任中隊長與政委的張培述所言，苗家祥因為「謝浩如、劉志丹、黃成章最近受團體之處分，反映到苗某身上，發生了我們的組織有消滅他、取消他的領導地位之疑心」。¹⁰⁰張培述在這裡所提到的幾個名字，黃成章就是前述武字區的群眾領袖黃子文，謝浩如即謝子長，他與劉志丹都是紅二十六軍的幹部，當時他們也在陝甘邊區被省委派去的特派員杜衡批判和處分。所以苗家祥的處境，並非特例，而是當時中共陝西省委質疑、打壓地方上在群眾間有威望的老幹部時，老幹部們所普遍面臨的困境。

八、結語

不過，陝西省委還未根本鏟除黃子文、孫銘傳、苗家祥等地方老幹部前，

⁹⁸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1-3》，頁185、199。

⁹⁹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1-3》，頁210-211。

¹⁰⁰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4-1936》，頁3。

渭北革命根據地在 1933 年 3 月初又遭到了一次大的圍剿。根據當時的報告，此次圍剿中，不僅根據地的中心武字區被敵軍占領，三原中心縣委也遭到破壞。¹⁰¹中心縣委不得不在 3 月再改組，由劉映勝擔任書記，趙伯平任副書記兼組織委員，李俊藻任常委兼宣傳委員，習仲勛、姚萬忠、王仲雲為委員。這幾人中，劉映勝、趙伯平、李俊藻是外來幹部，習仲勛、姚萬忠是富平縣幹部，王仲雲個人資料不詳。沒有武字區的幹部，這應該是因為武字區已經被占領，而該區的幹部都已經星散了。

事實上，這時由誰擔任三原中心縣委領導已經不重要了，因為渭北革命根據地實際上已經完全游擊化。就在武字區被占領後，陝西省委即指示三原中心縣委取消革命委員會，並將此一失敗告知群眾。革命委員會是根據地的政權，取消革命委員會事實上也等於宣告渭北革命根據地將沒有一塊固定的根據地。省委當時即指示渭北黨要普遍建立小的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後來三原中心縣委即根據省委指示，成立了「渭北工農游擊隊總指揮部」，負責指揮渭北地區的各游擊隊。¹⁰²

根據後來陝西省委給中共中央的報告，當 1933 年 3 月渭北根據地武字區被占領之際，省委曾一度提出反攻武字區的口號。但或許是因為敵軍勢力太強大，以及武字區遭到破壞太嚴重，省委日後自我批評說反攻武字區是「左」的空喊。所以後來渭北游擊隊就只是在武字區、心字區，以及富平邊界一帶進行游擊。後來渭北游擊隊還曾到耀縣與陝甘革命根據地的紅二十六軍會合。6 月，紅二十六軍第二團要南下到渭南一帶，渭北游擊隊曾一度配合紅二十六軍的行動。7 月，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南下失敗，省委在此時也決定渭北游擊隊第一大隊改編為紅二十六軍第四團。¹⁰³也正是因為渭北游擊隊一直處於各處游擊的狀態，所以游擊隊的領導比三原中心縣委更重要。

至於渭北工農游擊隊總指揮部的領導，自 1933 年 3 月以來，分別是：3 月時總指揮李平(劉傑三)、政委金天華、參謀長李天赦。金天華不久後離隊，

¹⁰¹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1-3》，頁372-385。

¹⁰²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4-1936》，頁23-25。

¹⁰³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4-1936》，頁228-230。

由張培述接任。5月時李平調回省委，張培述離隊，由黃子祥任總指揮，劉映勝為政委。劉映勝在7月時被派去協助發動兵變的耀縣王泰吉騎兵團，由張秀山接任政委。7月，渭北游擊隊第一大隊改編為紅二十六軍第四團時，則由黃子祥任團長，楊森任政委，李天赦任參謀長。

游擊隊總指揮部的幾任領導，李平即前述汪鋒提到被省委派來渭北的幹部，李天赦則是三原在地出身的幹部。至於幾任政委，張培述是省委特意提拔起來的涇陽籍貧雇農，金天華、劉映勝前面已有介紹，楊森則是乾縣人。所以基本上還是以省委派來的外來幹部為主。這些外來幹部都沒有在部隊裡擔任很長的時期。其中金天華還被批評1933年3月武字區被攻占、三原中心縣委遭到破壞時，「自由跑到西安」。三原中心縣委並指控他假借武字區委的名義拿走幾枝槍去做特務，得到鴉片十包，但是後來槍也沒有歸還，鴉片也不知道作什麼用了。¹⁰⁴

事實上，從當事人日後的回憶看來，在當時游擊隊中居於最關鍵地位的，並非這些來去不定的外來幹部，而是擔任游擊隊總指揮的黃子祥。黃子祥是黃子文的哥哥，至遲在1928年他就曾參加黃子文領導的武字區農民「交農」抗爭。當時他在民團裡當團附，可見他也在地方上有一定影響力，並且具有軍事經驗。當渭北革命根據地於1930年代初期開始建立時，他就是根據地重要的領導幹部。1933年3月武字區被占領，三原中心縣委成立了渭北工農游擊隊總指揮部，黃子祥從5月開始擔任總指揮。7月時，渭北游擊隊第一大隊改編為紅二十六軍第四團，團長也是由黃子祥擔任。當地出身的老幹部李鴻儒(也曾參加1928年的武字區交農抗爭)有一段很有趣的回憶。他說當渭北游擊隊改編為第四團，舉行授旗典禮大會時，「大會主持人和授旗人，我都不認識，只認得黃子祥在會上講了話」。¹⁰⁵這裡就可以看到地方老幹部在群眾間的號召力，不是那些來去不定的外來幹部可以輕易取代的。

黃子祥和他弟弟黃子文，以及武字區的地方幹部孫銘章、孫平章等人，即中共陝西省委杜衡所指摘的「老黨員」，他們很早就在其家鄉武字區加入

¹⁰⁴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1-3》，頁383-384。

¹⁰⁵ 李鴻儒，〈回憶武字區黨組織的建立及其活動〉，「延安紅雲」：

<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7626.html>(2021/12/8點閱)。

革命行列，並且帶領群眾進行鬥爭。這些人當中，有的本來就是異己階級出身，有的則是農民群眾出身，如孫平章與孫銘章等兄弟，但是後者在當地長期擔任領導幹部後，也成為中共陝西省委眼中尾大不掉的老幹部。至遲在1932年4月前後，陝西省委就開始批評乃至試圖取代這些地方老幹部。而省委所採取的辦法，一方面就是提拔當地農民群眾出身的幹部，再就是從外面調幹部到渭北革命根據地，取代地方老幹部。但是，那些從地方農民提拔起來的幹部，有的也是和孫銘章等人一樣資深的老幹部，以至他們在清除孫銘章等老幹部時，難免妥協。還有的農民幹部則是缺乏能力，他們被提拔起來純粹是形式，只是「空架子」。實際上掌握實權的是外來幹部。這些外來幹部敵視與打壓地方老幹部，但是外來幹部終究未能完全取代地方老幹部。至少在本文探討的時期，當渭北革命根據地崩潰後，繼續留在當地持續鬥爭的是黃子祥等地方老幹部。

黃子文等武字區老幹部被陝西省委派來的外來幹部打壓，陝西省委自身不也是被中央派來的巡視員批評嗎？如前所述，1930年前後的陝西省委、陝北特委以及西安市委，同樣都是由國共分裂前後即已入黨的知識分子幹部組成，他們也是資深的老幹部，其中許多也是異己階級出身者，不是工農階級出身。儘管陝西省委不斷呼籲提拔工農階級出身的幹部，但工農階級出身的幹部依舊占相對少數。1931年前後，在中央巡視員的主持下，陝西省委、西安市委還有蒲城縣委才強迫提拔了幾位工農出身的幹部。但結果很快就證明，這些形式提拔起來的工農幹部，不僅能力有限，在西安市委和蒲城縣委還造成了黨的破壞。最後在陝西省委等組織掌握實際領導權的，依舊是陝西在地出身的知識分子老幹部。

這又回到本文一開始所提到的中共陝西省組織的幾個特質，其中最顯著的即是濃厚的地方色彩。如渭北三原武字區或整個陝西省委，基本上即是由在地幹部作主，所以當地的黨務與革命活動，很難不受到當地客觀環境、群眾習慣，以及地方幹部主觀因素的影響，以至表現出濃厚的地方色彩。當中共上層想要強加其政策在當地時，如中央巡視員提拔工農幹部到陝西省委，或陝西省委、三原中心縣委提拔工農幹部取代武字區老幹部時，往往事與願違，即被提拔起來的工農幹部力不足以取代既有的幹部領導。甚至地方幹部

會抗拒執行上層的政策，如分配土地等等。所以此一時期陝西以及渭北地區的共產革命，毋寧表現出更多的地方色彩，而不是當時主導中共中央的「左」傾路線。

這個時期中共渭北地區和整個陝西省組織還有許多特質，這裡不可能一一詳述，最後只能再提到一點，即這個時期中共陝西省組織內部的整肅並不嚴厲。如陝西省委打壓渭北地區的老幹部或陝甘革命根據地的劉志丹和謝子長等幹部，儘管這些被打壓者可能被剝奪領導權甚或開除出黨，但他們最終並沒有被殺害。如果對比同一時期中共在南方各蘇維埃區域裡肅反的殘酷狀況，就可以發現陝西自身的整肅確實相對寬大。也因為這些被打壓者沒有被殺害，所以如黃子文曾在 1931 年被省委開除黨籍，或是在 1933 年被解除職務，但他實際上仍在中共黨、政、軍機關擔任重要職務。又如武字區的孫銘章等老幹部，他們即使被打壓，甚至被威脅逮捕，卻仍舊在幕後發揮重大影響力。或者如前述的黃子祥，還是劉志丹或謝子長，雖然暫時被剝奪領導權，但終究他們又會重新擔任領導幹部。這又印證前面所說陝西組織的一個特質，即幹部的變動性低。陝西的地方幹部在肅反中被大批殺害，那是 1935 年 9 月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在陝甘革命根據地發動的肅反。那時候打壓這些陝西地方幹部的就不再是同樣陝西出身的省委領導，而是來自外地的紅二十五軍了。但渭北革命根據地的那些老幹部，如黃子文、黃子祥、孫銘章等人，在後來中共中央也來到陝西後，仍沒有被中共殺害，但也持續的受到懷疑，儘管他們也仍繼續為中共革命運動服務，甚至為其犧牲了自己的生命。¹⁰⁶

¹⁰⁶ 這幾位武字區老幹部日後的經歷：黃子文在 1935 年 9 月徐海東紅二十五軍在陝甘革命根據地的肅反中也遭到逮捕，後雖獲釋，但似乎就沒有恢復黨的關係。抗戰時期黃子文參加安吳青訓班，但是在延安整風時又遭到中共迫害，後來一直到 1947 年他過世為止，他都沒有恢復黨籍。黃子祥在抗戰前最後擔任中共的職務是中共渭北工委組織部長、三原中心縣委副書記，整個抗戰時期黃子祥都沒有擔任中共的職務。1947 年黃子祥與黃子文在其家鄉響應共軍，過程中黃子文犧牲，而黃子祥則是再獲得中共任用，曾擔任關中軍分區副司令員等職，中共建國後還曾一度擔任陝西省交通廳廳長，不過在文革時也遭到迫害，改革開放後獲得平反，1982 年病逝。孫銘章後來經歷不詳，不過他在中共建國後仍存在，並留下了幾篇關於渭北革命根據地的回憶文章。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史料

-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94。
-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 (I)》。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94。
-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 (II)》。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94。
-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1-3》。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94。
-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4-1936》。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94。
-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六冊(1930)》。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
-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回憶資料卷1923-1936)》。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

1. 組織史資料

- 中共三原縣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陝西省三原縣組織史資料(1925.12-1987.10)》。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
- 中共陝西省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陝西省組織史資料》。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
- 中共富平縣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陝西省富平縣組織史資料(1926.5-1987.10)》。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
- 中共蒲城縣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陝西省蒲城縣組織史資料(1926.冬-1987.10)》。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

2. 縣志

安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安康縣志》。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蒲城縣志編纂委員會編，《蒲城縣志》。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

(二) 中文著作

- 中共三原縣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三原縣簡史(第一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2。
- 中國共產黨三原縣委員會編，《渭北革命根據地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6。
- 田武英，〈漫話瀘泊灘和鍋板鹽〉，《蒲城文史資料》，第4輯(蒲城，1989)，頁132-138。
- 任學嶺，《陝甘革命根據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原志軍，〈蒲城農運史上的「交農」鬥爭〉，《蒲城文史資料》，第1輯(蒲城，1985)，頁11-18。
- 許發宏，《秦嶺之子：汪鋒革命傳奇》。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
- 郭懷仁，〈回憶曹受祉及蒲城文化服務社〉，《蒲城文史資料》，第4輯(蒲城，1989)，頁85-91。
- 陳耀煌，〈北方地區的共產革命，1920-1927：一個組織史的考察〉，《新史學》，第26卷第1期(臺北，2015.03)，頁105-156。
- 陳耀煌，〈陝西地區的共產革命，1924-1933：一個組織史的考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3卷(臺北，2016.09)，頁41-86
- 縣委黨史辦，〈孫平章烈士簡傳〉，《三原文史資料》，第7輯(三原，1990)，頁77-86。
- 縣黨史辦，〈黃子文烈士生平活動簡述〉，《三原文史資料》，第3輯(三原，1987)，頁1-6。

1. 翻譯著作

周錫瑞著，石岩譯，《意外的聖地：陝甘革命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21。

2. 網路資料

- 李鴻儒，〈回憶武字區黨組織的建立及其活動〉，「延安紅雲」：
<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7626.html>
(2021/12/8點閱)。
- 汪鋒，〈渭北革命鬥爭的一些情況〉，「延安紅雲」：
<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7653.html>
(2021/12/8點閱)。
- 金天華，〈渭北游擊隊的一些情況〉，「延安紅雲」：
<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7639.html>
(2021/12/8點閱)。
- 苗作魁、張星煥，〈苗家祥與涇陽游擊隊〉，「延安紅雲」：
<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7657.html>
(2021/12/8點閱)。
- 孫海章，〈武字區革命鬥爭回憶〉，「延安紅雲」：
<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7638.html>
(2021/12/8點閱)。
- 馬宗德，〈政治保衛隊的建立及其活動〉，「延安紅雲」：
<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7643.html>
(2021/12/8點閱)。
- 張述升，〈武字區革委會及武裝鬥爭〉，「延安紅雲」：
<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7635.html>
(2021/12/8點閱)。
- 趙伯平，〈中共三原中心縣委的工作情況〉，「延安紅雲」：
<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7664.html>
(2021/12/8點閱)。
- 趙應奎，〈武字區革命鬥爭片斷〉，「延安紅雲」：
<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7641.html>
(2021/12/8點閱)。
- 劉林生，〈三原地下黨的一些情況〉，「延安紅雲」：
<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7663.html>
(2021/12/8點閱)。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Weibei Area, Shaanxi, 1930-1933

Chen, Yao-huang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history in Shaanxi before Mao Tse-tung's arrival with the Central Red Army in October 1935 has long evaded scholarly attention. Researchers who made rare mention of this period only touch upon Liu Zhidan, Xie Zichang, and the Shaan-Gan area where they were based. In fact, for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Shaanxi Province, there are still many interesting aspects deserving further exploration, especially the Weibei area where the CCP created its first rural base in Shaanxi. This article looks into the material on the early organizations of the CCP. By examining the history of CCP'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cadres active in this period, this article delineates the key features characteriz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Weibei area and, by extension, Shaanxi province, in the early 1930s.

Keywords: Shaanxi province, Weibei area,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ural base, organizational history